

楊守敬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觀海堂醫書

吳璧雍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提 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古醫書之量，堪稱臺灣第一，其來源主要是得自晚清藏書家楊守敬的收藏，本文即以此批醫籍為中心，記述楊氏搜書的經過及其書的特色和價值。大體分四個段落：（一）生平記略、（二）訪書始末、（三）入藏故宮始末、（四）故宮觀海堂醫書的特色與價值，其中第四項是本文分析討論的主要重點。

按故宮典藏記錄顯示，觀海堂醫書有407部，2,459冊，若依據時代和刊行或抄寫國別來分，大略可作以下幾種情形：宋刊本，有2部；元刊本，有12部；明刊本，有68部；清刊本，有43部；日本刊本，有78部；日本鈔本，有198部；朝鮮刊本，有6部。就比例而言，日本刊本和鈔本佔了半數以上，包括日本翻刻中土醫籍、日本影寫或傳抄中土醫籍、日人著作之刊本、抄本及手稿本等，這些雖只佔日本千餘年醫籍史的極小部份，但仍可看出中國傳統醫書對日本漢醫的影響力。若從各種版本及當時收藏情況分析，知相對於中土，日本醫生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故古醫籍被保存下來的機會也相對提高，此即楊守敬得以購得不少中土罕見醫籍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楊守敬、觀海堂、醫書、故宮、經籍訪古志補遺、清客筆話

一、緒 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古醫書之量，堪稱臺灣第一，其來源除了清宮舊藏和原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之外，主要就是得自晚清藏書家楊守敬收藏醫書。¹

楊守敬的觀海堂藏書，在晚清眾多藏書家中，並不以量多或罕覯而稱名，²但有一定的特色，袁同禮《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序云：

竊念此目雖非觀海堂藏書之全部，然所著錄為其他書目所不及者有二：一曰古鈔本，二曰醫書。日本所傳古鈔本多存隋唐之舊，其價值當出宋元刊之上，今歸然獨存，而為一般收藏家所未見。至醫籍秘本，大抵皆小島學古舊藏。學古三世以醫鳴於日本，藏書之富罕有其匹，今觀其所收者，多為各書目所未載，實非書城之巨封，文苑之寶藏耶。³

本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楊守敬醫籍為中心，記述其搜書的經過及此批醫書的特色和價值。大體分四個段落，（一）生平記略：以楊氏自訂年譜為綱，略述其生平重要事蹟；（二）訪書始末：亦以其自訂年譜為主軸，輔以楊氏所撰《日本訪書志》、⁴王重民輯《日本訪書志補》、⁵森立之等人所編撰《經籍訪古志》⁶，

1 按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記錄，目前子部醫家類的種數約599部，即清宮舊藏和四庫全書、四庫薈要凡148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43部，捐贈1部，其餘則為觀海堂藏407部。吳哲夫曾於〈中華民國臺灣省現藏古代域外漢文醫書之探討〉一文中，提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750部」，（參見《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出版，1987，頁112），與筆者計數的結果有很大的出入，這可能和計數方式有關，譬如由明人王肯堂編、吳勉學刊印的《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是一部彙編性質的叢書，內容包含44種醫書，此在筆者的認知是1部書，但於現行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之〈子部醫家類〉卻著錄45筆，即彙編1筆，細目44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1983），頁684-737，其他彙編性質的書亦然，因此，「部」與「種」的定義需先釐清，並取得共識，才可能得到比較確實的數量。筆者目前以為，如《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是1部叢書，其中有44種書。

2 晚清藏書家如劉承幹「嘉業堂」，在藏書最多的時候，據說有12,450部、16萬冊、60萬卷以上；傅增湘「雙鑑樓」據民國18年編印的《雙鑑樓善本書目》，其中宋本書多達180餘部，比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還多。（參見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傅增湘雙鑑樓〉、〈劉承幹嘉業堂〉（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頁92-95、頁216。

3 何澄一編《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卷首序，民國21年排印本。收入嚴靈峯編輯《書目類編》第38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4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十六卷，臺灣廣文書局於1967年影印編入《書目叢編》，1981年再版。1988年至199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排印本《楊守敬集》全13冊，其第8冊收錄《日本訪書志》，卷前有劉昌潤所寫〈前言〉，提及：「《日本訪書志》初稿，多成於駐日使館中，每得一書，則為題識。檢重慶圖書館所藏原稿，書寫潦草，塗乙滿紙，蓋倉促間所寫者。歸國又有補撰，前後積稿二十餘冊。以無同好切磋，擱置十四年之久。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始謀刻梓，歷五年刊成。今知《訪書志》有兩種版本，一本扉葉篆書：『日本訪書志十六卷』，先生婿東莞黃志孚署，葉背匡欄內題：『光緒丁酉嘉平月鄰蘇園開雕』。一本題：『日本訪書志初編十六卷』，葉背匡內欄內題：『光緒辛丑宜都氏開雕』，旁注『《晦明軒稿》附』。兩者相距四年，似當以後者為完備；及檢柯逢時舊藏辛丑本，反較丁酉本少跋文九篇及王子安佚文，無目錄，無《訪書緣起》。」（《楊守敬集》第8冊），頁19。廣文書局影印者為丁酉本，前附楊守敬辛丑四月手書序，無目錄，亦無〈訪書志緣起〉一文。

以及楊氏與森立之筆談記錄《清客筆話》⁷等書，用以勾勒楊氏在東瀛訪書概況；（三）入藏故宮的始末；（四）故宮觀海堂醫書的特色與價值，這是本文分析討論的主要重點。

二、生平記略

楊氏於七十三歲之年自訂《年譜》，其前有一小段短文云：

三十年前，日者推余命，流年止七十三，而中間所云休咎皆驗。前年，義州李文石（葆恂）勸余自爲年譜，余謙讓未遑。今年，日本人多問余小傳，雖漫應之，未下筆也。八月，武昌事起（宣統三年，1911），倉皇出走，家人星散，藏書數十萬卷、衣物、財產棄之不能一攜。間關至上海，蒙舊友香山甘君翰臣（作蕃）假館僦居。棲息略定，而有日本水野疏梅者，夙聞余名，由其國福岡縣遠來，欲至武昌從游，中途遇於滬，堅欲置身門下，卻之不得；其人年已四十有八，念其向學之忱，乃受之。又欲得余小傳，歸而告其國人，今年命將盡，乃徇其請，追述生平。⁸

此段文字應該是寫於宣統三年（1911），若往上推七十三年，即楊氏自訂之生年——道光十九年（1839），這是一般介紹楊氏生平小傳所遵循的紀年。但近人根據楊氏於同治元年鄉試時所填的「硃卷」履歷，其上記有生辰八字，作「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時」，認爲楊氏真正的生年應是道光二十年（1840），推翻了楊氏自訂的時間點；⁹但無論其生年爲何，並不能改變楊氏自訂的年譜是其一生極重要的參考資料。

5 王重民於民國十五、六年間任職故宮圖書館時，輯成《日本訪書志補》，本文所參考者爲199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排印本《楊守敬集》第8冊所錄，前附孫楷第民國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序，參見《楊守敬集》第8冊，頁381。

6 《經籍訪古志》的編撰者雖署森立之、澠江拙齋，實際上編纂作業是由狩谷棧齋發其端，其他還包括小島寶素、小島尚真、堀江舟庵、伊澤蘭軒、海保漁村等人校讎、訂補，最後由丹波元堅完成定名，其間三易其稿。參見清光緒十一年印本，《經籍訪古志》卷首澠江全善、森立之〈序〉。又參長澤規矩也〈經籍訪古志考〉，《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二卷》（東京：汲古書院，1982），頁166。

7 《清客筆話》係森立之與楊守敬於光緒七、八兩年的部分筆談內容，並及名片、短簡、留言、借條、邀請函等，原藏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森氏題爲「清客筆話」，今由陳捷整理，編入《楊守敬集》第13冊，頁519-549。

8 郝志羣整理，〈鄰蘇老人年譜〉，收入《楊守敬集》第1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頁7。

9 參見謝承仁〈楊守敬生年辨證〉，謝氏認爲《硃卷》是科舉時代爲防止徇私舞弊，考生試卷務須經謄錄人用朱筆謄錄一遍，然後送交考官評閱，其上有本人的生辰八字，基本上是不能有絲毫的不真，而楊氏應考時所填的生辰既是「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時生」，所以《年譜》的「道光十九

從《年譜》上看，楊守敬早年喪父，端賴祖父開店經商養育成人。在二十歲之前，生活範圍大抵不出宜都鄉里，其間因從朱鳳池先生附讀，在旁聽聞其與譚大勳、許滋生等人談古論今，始知汪容甫的緒論，由此識得清朝諸儒之學；而且因見其租戶鄭蘭晒書中有六嚴之《輿地圖》，即假之影繪，成為日後專事歷史地理學之契機。

同治元年應湖北鄉試，中第八十名舉人；此後雖屢赴京師參加會試，皆不中，改以授讀為業。而京城人文薈萃，因得結交當世學者而眼界漸開，¹⁰也開始在肆廠購買金石碑版或稀見之書，都中之人漸知其名。

光緒六年四月，應駐日公使何如璋之召，以使館隨員的身份東渡日本；¹¹光緒七年，駐日公使改由黎庶昌出任，仍留為隨員。故由光緒六年四月至十年五月歸國，前後四年，楊守敬得以在日搜訪舊籍，以遂其「搜羅放佚」之志，也成了日後觀海堂藏書的重要來源。其間因又助黎庶昌公使編刻《古逸叢書》，受黎氏囑託，更極力搜訪，至光緒十年，書刻成，「督印百部，黎公以贈當時顯者，皆驚為精絕。」¹²但楊氏認為並不理想，故《年譜》於此年下記：

其實所刻之書不盡要典，如蔡刻《杜詩》，廣東尚有刻本；《莊子注疏》亦載《道藏輯要》中，而慧琳《一切經音義》、楊上善《太素經》等書皆未刊，頗為遺恨，然黎公作主，何能盡如我意。¹³

此怨言復見於《日本訪書志》卷一《尚書釋音》條下，其云：

年（己亥）顯然有誤。謝氏認為，錯誤的造成是由於楊守敬年事已高而記憶不審所致；因為《年譜》中其父的卒年月日也與《和州楊氏三修家譜》不合。而楊氏記憶之誤，係緣於太過相信日者之「流年止七十三」之言，認為自己「今年命將盡」，以致悲觀絕望，精神恍惚，連自己的生辰都記不清了。（參《楊守敬集》第13冊，頁441-445。）但從《清客筆話》〈辛巳八月二日楊守敬來訪〉一段，森立之記楊氏語曰：「僕以前專心金石文字，于經史未用功，近日始頗有意學之，然年已四十有三，兩鬢已白，恐終無成耳。」辛巳，年四十三，和自訂《年譜》是一致的，則楊氏對自己的年齡似未弄錯。（見《楊守敬集》第13冊，頁535。）

10 同治二年譜：「正月入都，寓荊州會館。由一山得見文昌潘孺初先生，歸善鄭鐵香同年……守敬得聞緒論，智識日開。」（見《楊守敬集》第1冊，頁10）；又袁同禮〈楊惺吾先生小傳〉：「潘鄭皆以學問文章稱一時，先生日接其言論，進德甚速，一生學業多得力於此時。」《圖書館學季刊》第1卷第4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26年本，1969年2月）。

11 楊守敬是以英語通譯員的名義擔任隨員，見實藤惠秀撰，陳國亭譯《明治時代中日文化的連繫》第五章〈日人岡千仞中國論〉一、「觀光紀遊」：「明治十年，清國初代公使何如璋到任，在他下屬有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英語通譯楊守敬」（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1），頁121。

12 《年譜》甲申年條，《楊守敬集》第1冊，頁19。

13 按慧琳《一切經音義》指的是楊氏《日本訪書志》卷四所著錄之「日本藏高麗藏本」，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為日本元文二年江戸獅谷白蓮社印本，上有日本「勝鹿文庫」收藏印，黎庶昌《古逸叢書》卷首序亦提及：「有白蓮社刻本最為完整可據……以卷帙繁重，未能謀刻」，此本卷前附楊守敬手書題識，署「光緒甲申四月」，但內容與《日本訪書志》稍異。楊上善《太素經》指的應是

余在日本校刊古逸叢書，黎星使女婿張君沆得影寫此本，議欲刻之。余謂此書非得之日本，似不必彙入，且此書非陸氏之舊，乃宋人之書，星使駭然。……張君意存見好必欲刻之，余亦未便深拒。¹⁴

此《尚書釋音》即《古逸叢書》中所收《影宋蜀大字本尚書釋音》。¹⁵

楊氏歸國後任黃岡教諭。光緒十二年，又入都應試，不中，從此絕意科名，專心著述。十四年，在黃州築「鄰蘇園」以藏書，因城北即東坡赤壁，故以名，並自署「鄰蘇老人」。二十三年，擬刻《日本訪書志》及《留眞譜》；二十五年，應張之洞電召，擔任兩湖書院教習；二十七年，《日本訪書志》及《留眞譜》刻成；次年，改書院爲學堂，別立勤成學堂，遂轉任勤成學堂總教長。三十二年，選授安徽霍山縣知縣，張之洞勸其赴任，以年老不耐簿書辭之。次年，改勤成堂爲存古堂，仍任總教，隔年辭職。宣統三年，辛亥革命事起，避禍上海，但時以家中藏書爲念；後知日人寺西秀武已請當時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在其家張貼告示，保護其藏書，觀海堂之書因而免遭兵厄；故楊氏於自訂《年譜》最後有極感慨之語云：

吁！世之藏書者，大抵席豐履厚，以不甚愛惜之錢財，或值故家零落，以賤值捆載而入；守敬則自少壯入都，日游市上，節衣嗇食而得；其在本，則以所攜古碑、古錢、古印之屬交易之，無一倖獲者；歸國後，復以賣字增其缺，故有一冊竭數日之力始能入廚者。天鑒艱難，當不使同絳雲一炬！若長此不靖，典籍散佚，則非獨吾之不幸，亦天下後世之不幸也。涕零書此，知我者，其勿以不達笑我。¹⁶

《年譜》就止於是年。以下至其歿（民國四年一月九日，舊曆甲寅十一月廿四日），則爲楊氏弟子熊會貞所記。

楊氏生當晚清世變動蕩、机陞不安之際，一生仕途不顯，唯戮力於學術研究與文獻收集，因此在歷史地理學、版本目錄學、金石、書法上都有相當的成

《日本訪書志》卷九之「影古鈔卷子改摺本之《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廿三卷又零殘一卷》」，亦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上有小島氏父子手書題記及親筆校語，爲楊氏所稱「初影本」。但此本並無楊氏之手書題識，反而是附於另一傳鈔本之卷首，此傳鈔本之封面題箋亦楊氏手書，此抄本或許是緣於黎氏無意刊刻，故楊守敬請人影鈔一部，而將題識附於前，惜《日本訪書志》並未說明。

14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上）》卷一（臺北：廣文書局，1981），頁23。

15 是書雖題《影宋蜀大字本尚書釋音》，實摹刻自潘錫爵影鈔宋本，書後刻有潘氏跋文，按日人長澤規矩也對《古逸叢書》中部份所謂影宋、覆宋本頗覺可疑。見長澤規矩也，〈古逸叢書の信憑性について〉，《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東京：汲古書院，1982），頁489-502。

16 《楊守敬集》第1冊，頁27。

就，¹⁷ 尤其是中年初期的一趟東瀛之行，不但眼界擴大，也確定自己搜書的方向，「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不但使中土已佚古籍得以回流，也大量購入或傳鈔日本古鈔本，「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其中雖無秦火不焚之籍，實有裔然未獻之書。」¹⁸ 觀海堂因而成為晚清諸藏書家中具有特色者。

三、訪書始末

楊守敬開始搜購古籍應在同治二年入京參加會試以後，是年譜有「會試報罷，已在肆廩買得未見書盈車」，其後更常至琉璃廠，但大抵以碑版金石為主，¹⁹ 真正大量搜書還是在赴日之後，不過，《年譜》只在光緒壬午（八年）以回顧的口吻敘述：

先是余初到日本，游於市上，睹書店中書多所未見者，雖不能購，而心識之。幸所攜漢、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見，又古錢、古印為日本人所羨，以有易無，遂盈筐篋。及黎公有刻書之議，則日日物色之，又得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抄本。其時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購者，不惜重值，遂已得八九，且有為立之所不載者數百種，大抵醫書類為多，小學類次之。²⁰

事實上，光緒六年初至日本時，楊氏曾寫信給李慈銘，言：

日本古籍甚多，所見有唐人寫本玉篇，又有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隋杜臺卿玉燭寶典，皆鈔本，其餘秘笈尚夥。隋唐以下金石文字，亦美不勝收。彼國自誤之書，與中土可證者尤多。²¹

此亦可證〈日本訪書志緣起〉所稱「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之語，此文末署「光緒辛巳二月」，但楊守敬此時到底收了哪些書，其實並沒有具體書目可尋，比較清楚的是，此時楊氏擁有森立之等人所輯的《經籍訪古志》抄本，可說是其訪書

17 歷史地理學方面有《歷代輿地圖》、《水經注疏》；版本目錄學方面有《日本訪書志》、《叢書舉要》；金石學方面有《湖北金石志》、《三續寰宇訪碑錄》等著作；書法方面深受日人重視，日本《書道全集》有文介紹，並推崇之，其一生的著作究竟有多少，據近年大陸方面的調查，約有八十三種。參見《楊守敬集》第1冊〈總序〉，頁5。

18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楊守敬集》第8冊，頁27。

19 同治四年譜：「是時鐵香亦好金石，每日游市上覓所得，其精者歸鐵香，其次者守敬收之，緣守敬無力買精者。」《楊守敬集》第1冊，頁12。

20 《楊守敬集》第1冊，頁18。

21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記，參見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引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30-31。

相當重要的依據。²²

不過根據《清客筆話》所記，楊守敬撰寫〈緣起〉時，有些書應該只是看過，並未得手。譬如在〈緣起〉中提及「宋本《隸釋》」，是楊氏所謂「急宜刊布者」之一，但此書在《清客筆話》中是光緒七年的四月十八日才談到。

楊云：「此《隸釋》如果從宋板出，僕願以重價購之。但必借一本與汪本校之，而後知其可貴。先生如不借，僕亦不知其果從宋板否？」²³

其後在五月十七日的談話又提了一次，如下：

楊：「前日《隸釋》僕甚愛之，惜此書缺二冊，貴邦抄本或原本，必再有存者，能為補全否？」

森：「不知官庫書目中有之否？若有之，則宜得寫乎！」

楊：「此書《訪古志》不載，何耶？」

森：「《訪古志》不載者不啻此。《訪古志》之義在于此：其不論古今，無復有無復見之書，隨見聞錄之爾。在于今日，則又作一《訪古志》而補足則可爾。」²⁴

可見當時楊氏並無此全書。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隸釋》為影宋鈔本，卷首有「森氏」陽文朱印，知原為森立之物，而且是森氏自官庫中抄出者。因此，〈日本訪書志緣起〉的撰寫只能說是一些訪書或撰寫題志的原則，實際上當時有許多書並未得手，當然題記也只完成一部份。以下就〈緣起〉的內容，歸納成幾個訪書和書志撰寫的原則：²⁵

（一）收錄原則

1. 參考諸家譜錄，凡有異同或罕見者，皆甄錄之。
2. 《經籍訪古志》著錄為明刊本，雖在日本為罕見，而實通行於中土者，不載。
3. 日本習見而中土罕遇者。
4. 日本翻刻之舊本而未流傳於中土者。

22 按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亦云：「然余之所得為此《志》之所遺，正復不少。」《楊守敬集》第8冊，頁27。

23 《楊守敬集》第13冊，頁525。

24 同上註，頁528-529。

25 另參見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第五章第一節〈輯成專書—日本訪書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7月，頁118-120。又郭秀梅認為：「楊守敬的《日本訪書志》，從命名到體例，都有模仿森氏等《經籍訪古志》的墨跡。」郭秀梅，〈江戸考證醫學初考〉，《新史學》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頁131。

（二）收書概略

1. 醫書：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豐富，故多收羅醫籍。
2. 佛典：日本崇尚佛法，即遇戰亂，亦不燬古刹，故佛典多。
3. 朝鮮刊本：日本多朝鮮古刻本，皆豐臣秀吉征朝鮮時劫掠而來。
4. 日人著作：除日本學者之撰述外，兼收采錄古書而不參入個人論議者。
5. 韓人著作：如《醫方類聚》為日本活字本。

（三）書志體例及內容撰述原則

1. 沿襲《經義考》的體例，凡四庫未著錄者，宋元以上並載序跋，明本則選擇有考證者載之。行款、匡廓亦詳於宋元而略於明本。雖傷繁冗，但可供好古者參閱。
2. 凡習見之書不載撰人名氏，罕見之品則詳錄姓氏，間考爵里。

（四）別作年號對照表

由於古鈔本及翻刻本多載日本紀元，名目甚繁，若別為一表，可方便考校。但實際觀察現行的《日本訪書志》，此表並未做成。

而從《清客筆話》也知，楊守敬的確很早就得到森立之等人共同纂輯的《經籍訪古志》，按卷一，辛巳三月廿九（朱筆改八）日載：

楊云：「頃購得《經籍訪古錄》，知先生為狩谷高足。敬于貴邦最服膺狩谷氏，以為第一流。觀先生所著《訪古錄》，知於古書源流真偽辨別精審。弟近日欲刻此書，但此書中抄寫頗有訛字，不敢臆定，願先生校而後刻之。」²⁶

其實《經籍訪古志》抄有多本，當時楊守敬所得亦不只一本，²⁷此從《清客筆話》〈卷二，辛巳七月廿一日〉所載可知。

森：「《訪古志》醫家部已寫成。過日有不用之告，然則在拙家亦可，不冀入君架中也。」

楊：「弟前日求之甚急，已得二部，故未知公已囑人抄之也。彼既不冀入我架中，則可他人藏之。」²⁸

而且從同日之對話亦知楊氏所得抄本並不全。

26 《清客筆話》，《楊守敬集》第13冊，頁521。

27 按《清客筆話》整理者陳捷亦有註解云：「據《筆話》至少可以推斷，楊氏當年所獲《訪古志》不止一個本子。」《楊守敬集》第13冊，頁550。

28 同上註，頁529。

楊：「我所云《經籍訪古志》也。此書以公所見有多漏者，故欲公補之。」

森：「補正之則可。吾亦有此意，無寸暇，故不果。在今日則吾不作之，則何人能為？將勉為之。」

楊：「此不必廣搜也，但以公所見補之足矣。」²⁹

楊守敬一直有意幫森立之刊印《經籍訪古志》，但一直未有結果，直到楊氏回國之後，才由繼任公使徐承祖責成隨員姚文棟以鉛字排印，³⁰當時曾贈送一部給楊氏，楊氏參考此志，將自己所購藏的部份舊籍一一在書眉上寫下批語，此鉛印本後來流落北京書肆，為日人橋川醉軒（時雄）所得，其第一冊封面有楊氏手書云：

大抵此書所載佳本，守敬約得其半，其不能得者，亦多方影抄之。至于奇籍出于此錄之外者，守敬亦多有之，俟訪書志成而後知守敬苦心搜羅，為日人所驚訝者也。

第二冊題簽「經籍訪古志」五字亦楊氏手跡，但其他三冊之題簽則為他人所題；其第二冊並記有：

此原題簽未全者，予為補之，字體所遜，不逮遠甚。

第四冊又記：

庚子閏秋中浣得之。冊面有守敬跋識。意即今所謂楊瘋子者。洵博雅君子也。卷眉亦有批語。雅愛好之。爰出二千五百京蚨購歸。共六卷。附補遺一卷。所載皆醫部。時正亂後。□議之未定局。猶見貴生腐態□習難忘耳。楚北憤憤生漫記。³¹

長澤規矩也推測，此鉛印本大概是庚子事變時散出的。其書眉之注記有以下幾種情況：

29 同上註，頁530。

30 見《清客筆話》卷十，「《經籍訪古志》排印之原始（朱筆）」，《楊守敬集》第13冊，頁547-548。又森立之於此鉛印本後有一跋云：「此書曩者守敬楊氏以重價得一本，甚愛之。余曰：『此本係偷抄，其誤不少，原本一部在我手，宜校正。』其後未及校正而分手。」（見清光緒十一年鉛印本卷末）按《清客筆話》整理者陳捷有註解云：「長澤規矩也《楊惺吾日本訪書考》指出，森氏所謂受徐氏之託以原本手校云云，從徐氏印本的內容看，並不可信。長澤先生據此推測，或許初稿本當時已不在森氏處，故森氏無由比校（《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二卷，汲古書院，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版）。按此日筆談中森氏有『《訪古志》淨書本寺田弘攜去，今無之』之語，可為長澤先生的意見提供一個旁證。」《楊守敬集》第13冊，頁550。

31 以上五冊之題記俱參見長澤規矩也〈楊惺吾日本訪書考〉所引，《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二卷》（東京：汲古書院，1982），頁235-236。

- 1.最普遍的一種爲：「在飛青閣」、「今在飛青閣」、「飛青閣藏」、「飛青閣亦藏一部」等。
- 2.詳細一點的則爲：「今在飛青閣，此書與閣本大不同，宜重刊」、「今在飛青閣，森立之所贈」或「今在飛青閣，然非佳本也」、「此書未借校，一大恨事」等等。
- 3.獲闕本記：「今殘在飛青閣」、「今缺一冊補抄在飛青閣」等。
- 4.獲影寫本記：「飛青閣有影抄本」、「飛青閣得狩谷望之影抄本」、「原本見之未購成，飛青閣得影寫本」（按此指影南宋本《諸病源候論》）等。
- 5.獲傳抄本記：「飛青閣得傳抄本」、「飛青閣有抄本」等。
- 6.獲影抄本又失之者記：「此二本舊得影抄本，今失，可惜也」。
- 7.獲又賣之者記：「謝幼槃文集，宋。飛青閣得之。後歸潘伯寅尚書。」
- 8.獲又失之者記：「陳簡齋詩注，朝鮮刊。飛青閣得之。後失於日本。」
- 9.獲別本而加注者，這種情形相當多，如《古文孝經》，記「日本古文孝經舊抄本甚多，余所得凡十五本。」《論語》上記「日本古鈔論語甚多，余所得幾二十通。」《註解傷寒論》，上批「飛青閣得重刊本」，皆極其詳細。
- 10.其他：因見著錄而記述者，以原藏楓山官庫者爲多，亦有私人藏書，如：

《後漢書》 宋。此校傳錄本，余于書肆見之，索價甚昂，余以元校尚在官庫，可以借出過錄，厥後竟無暇日，未錄，差滿而歸，獨此恨事也。《論衡》 宋。此本在木村正直家，索價甚昂，余借校之。今本脫一葉，並刻於《留真譜》中。³²

凡此皆可見《經籍訪古志》對楊守敬訪書的重要性，而且也可知楊氏由此志獲得了哪些古籍。

觀海堂藏書原有多少，各方記錄不一，³³ 因爲楊守敬本人或其後人從未編過觀海堂藏書目，另一方面，楊氏的藏書在其生前及身後已頗多散佚，除了少

32 以上十則均參見長澤規矩也《楊惺吾日本訪書考》，（同上註），頁236-251。

33 按楊氏自己於《北齊人書左氏傳跋》云：「東瀛一行，著錄數萬卷」，《鄰蘇老人手書題跋》（臺北：學海書局影印本，1979）；容肇祖《史地學家楊守敬》引楊氏給黃芇的信云：「弟現在所藏書已幾十萬卷，就中有宋版藏書五千六百冊」。見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光緒九年）譜所引，（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36。

數爲其他藏書家購去，如潘祖蔭的「滂喜齋」曾擁有楊氏的北宋本《廣韻》和南宋本謝幼槃《竹友集》，³⁴鄧邦述「群碧樓」輾轉購入南宋書棚本《唐李推官披沙集》³⁵（今藏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傅增湘、張鈞衡亦購入一些珍本，有的則在輾轉流傳之後，早已不知去向了，³⁶但故宮博物院所藏應屬最大宗。

四、入藏故宮

民國四年，楊守敬逝世之後，

其藏書以七萬餘金鬻諸政府，藏於政事堂，日久頗多散佚。七年冬，徐總統（徐世昌）以一部份撥付松坡圖書館，約十之五六，所餘者儲於集靈園。十三年秋，余由歐返國，供職國務院，曾以公開閱覽，進言於黃君膺白。未幾黃君去職，事遂寢。本年（十五年）一月，由國務院撥故宮博物院保存，儲於景山西之大高殿，爲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分館。³⁷

可見賣給政府之後，還散佚不少，最後分貯松坡圖書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十七年，「故宮博物院組織法」通過，故宮圖書館正式成立，特設「觀海堂書庫」以保存。³⁸

民國十九年，孫楷第於《日本訪書志補》序又云：

民國己未（八年），觀海堂書將出售，吾師沅叔先生時長教部，慫恿當局買之，書遂爲國有。初度於集靈園，旋歸故宮圖書館。³⁹

與袁同禮的說法有點出入，但知楊氏之書是由當時在王世珍內閣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主持收購，時間在民國八年。

民國二十一年，故宮圖書館整理楊氏藏書，出版《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由何澄一主編，時袁同禮任館長，爲書序時卻又云：

34 （清）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再版本（臺北：廣文書局，1988），卷一、卷三，頁27-32、頁161-165。

35 鄧邦述《群碧樓善本書目》有著錄（臺北：廣文書局，1967），頁53-55。

36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第三章〈楊氏觀海堂藏書現況〉（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頁74。

37 袁同禮〈楊惺吾先生小傳〉，《圖書館學季刊》，第1卷第4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26年本，1969年2月），頁642。

38 那志良，《故宮四十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21。

39 孫楷第《日本訪書志補》前序，《楊守敬集》第8冊，頁383。

其藏書全部以國幣三萬五千元鬻諸政府，己未，徐總統以一部份撥交松坡圖書館，所餘者儲於集靈園。丙寅（十五年）一月，撥歸故宮博物院保存，儲於大高殿，為故宮博物院圖書分館。己巳冬（十八年）移於壽安宮，專室度藏，公開閱覽。今就故宮所藏者由何澄一編成簡目，聊備稽考而已。⁴⁰

不知為何與其前所撰楊氏小傳不同。

今知北大保留一封民國十四年三月，時任松坡圖書館館長梁啓超「為請續撥藏書事」，寫給臨時執政段祺瑞的擬稿，其中提及

七年春間，我執政在國務總理任內，又特撥國務院所儲故紳楊守敬藏書交館存貯，啓超等祇領之下，感激莫名。⁴¹

知撥交時間應在民國七年。⁴²但松坡圖書館在民國八年一月，梁啓超逝世之後就沈寂了，如今更是成了歷史名詞，⁴³據說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已和悅心殿合併，改為北京圖書館分館。⁴⁴

至於撥給故宮博物院的楊氏藏書，按袁同禮的說法，應有原藏書的二分之一弱。今按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記載，凡1,634部，15,491冊，其中醫家類，407部，2,459冊，比例上不可謂不多。

五、故宮觀海堂醫書的特色與價值

楊守敬訪能得如此多的醫書，其實是因緣際會，因為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對傳統漢醫採取抑制措施，譬如：

明治八年（1875）二月和明治九年（1876）一月，分別下達到東京、大

40 何澄一編《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卷首序，民國21年排印本。收入嚴靈峯編輯《書目類編》第38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41 吳銘能〈關於蔡松坡史料二三事—首次公布梁啓超親筆文稿〉，《書目季刊》，第35卷第4期（2002年3月），頁62。

42 黃克武，《蔣復璁口述回憶錄》第四章〈我與圖書館〉也提及此事：「任公為紀念蔡松坡，於上海創辦了松社，當時的北京政府收購了藏書家楊守敬的一批書，撥給松社，後來松社取消，這些書便搬到北平，成立了松坡圖書館，地點則設在北京石虎胡同七號，館長為梁任公。……民國八年，我到松坡圖書館協助編目工作。」似也可作為旁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史料叢刊42》，頁41-42）。

43 黃克武，《蔣復璁口述回憶錄》第四章〈我與圖書館〉之註解1云：「抗戰勝利後松坡圖書館則因經費困難關閉，隨後併入了北平圖書館。」（同上註）。

44 同註41，頁63。按該文作「北平圖書館」。

阪、京都三府和各縣的醫師考試法規定，今後欲開業行醫者，必須通過理化、解剖、生理、病理、藥劑、內外科等六門考試，才能領取行醫執照。

明治十二年（1879）二月，又公佈了更加詳密的醫師考試規則。⁴⁵

一時之間，大批醫員失業，地位下降，生活頓失所依，賣書似也成了生存之道之一。楊守敬於此時被派往日本，接觸到一些落拓的醫員，尤其是曾為福山醫員的森立之，⁴⁶透過他，楊守敬獲得了一些生活困窘的醫員如小島尙質之藏書。

如前所述，故宮藏觀海堂醫書有407部，若依據時代和刊行或抄寫國別來分，大略可作以下幾種情形：

宋刊本	元刊本	明刊本	清刊本	日本刊本	日本鈔本	朝鮮刊本
2	12	68	43	78	198	6

從比例上看，宋元刊本的數量相當少，日本鈔本特別多，這種現象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宋元版醫書流傳到現在本來就有限，何況還從日本回流到中土，其數量當然更少，若從澀江全善和森立之等人所編纂之《經籍訪古志補遺》（以下簡稱《補遺》）來觀察，⁴⁷會發現宋元本多藏於幕府官庫（雅稱楓山秘府、楓山文庫）或各藩府、貴族之家，要取得並不容易，故楊氏或「多方影抄之」，始取得久佚中土的醫籍。⁴⁸

同樣的，對日本醫員而言，要取得中國進口的醫書也不容易，故傳抄還是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⁴⁹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即影鈔懷仙閣藏南宋本，前有楊氏手書題識，云「此本為小島學古從宋本影摹者」，且

45 陳捷整理《清客筆話》，卷二註解16引「深川晨堂《漢洋醫學鬥爭史·政治鬥爭篇》504頁，醫聖社，1981，3月復刊版」之語。《楊守敬集》第13冊，頁551。

46 《清客筆話》卷二記光緒七年五月十七日的筆談，楊守敬問：「先生于醫道用功甚深，近日未聞為人診病，何耶？」森立之的回答充滿了感慨，因為當時的他只是大藏省下印刷局的一名編輯而已，並不能執刀圭。《楊守敬集》第13冊，頁526-527。

47 《補遺》只收醫籍，是最後才編入的，廣文書局所印行者並無《補遺》這一部份。

48 也許因為楊氏多由影抄宋元本而得，以致引發葉德輝幾近人身攻擊的批評，葉氏云：「至宜都楊守敬，本以販鬻射利為事，故所刻留真譜及所著日本訪書志，大都原翻雜出，魚目混珠。蓋彼將欲售其欺，必先有此二書，使人取證，其用心固巧，而作偽益拙矣。」《書林清話》卷十〈近人藏書侈宋刻之陋〉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頁535-536。

49 因為當時舶載來日的中國書籍，受長崎奉行之命，須優先收入紅葉山文庫，而各藩府雖搜書，但奉獻貴重書籍給中央也是一種義務，故各藩府醫員未必可得見原刊。即使是幕府官立的江戸醫學館，雖然有中央賜予，但也有不少是因為取得了借用許可證而影抄來的文獻。此江戸醫學館原為多紀元孝之私塾，創於1765年，最初稱躋壽館，1791年之後成為幕府官立醫學館，仍由多紀家主持。參見真柳誠、王鐵策〈日本內閣文庫收藏的中國散佚古醫籍〉，《中華醫史雜誌》，28卷2期（1998年4月），頁66-67。

摹有「金澤文庫」印，⁵⁰ 書中鈐朱方「小島氏圖書記」，又有「九折堂山田氏圖書之記」，知其後流入山田業廣之手。⁵¹ 據《補遺》著錄，懷仙閣藏南宋槧本，其每卷鈐金澤文庫印，此南宋槧本今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又《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十八卷亦為影抄本，當時楊氏曾在鉛印本《補遺》上批記「飛青閣有影抄本」語，⁵² 其原刊藏於醫官河野氏，按《補遺》引河野《家乘》曰：「文祿之役，始祖通幸從筑前中納言隆景在軍，此其所獲。」⁵³ 此本上鈐小島寶素印，應亦其影抄者。

當然，這許多鈔本也不盡然都是影鈔宋元本，其中也有不少輾轉抄自明刊或日本古寫本，甚至有日人手稿，但總體而言，日本鈔本所佔的比例最多，若再加上日刻本，則已超過故宮藏楊氏醫書的半數，其他則屬日方的進口書籍；⁵⁴ 而進口書收得少，或緣於楊氏所謂，「在彼以為罕見在我則屬通行者」⁵⁵ 故不收，因此故宮的收藏不過一百三十多部而已。⁵⁶ 以下將這些回流中土的刊本略作分析：

（一）宋刊本

1. 《備急灸法》一卷 宋聞人耆年撰 題宋淳祐五年刊本

《補遺》著錄「宋槧本，寄所寄樓藏。每半板十行，行二十四五六字」，⁵⁷ 楊

50 金澤文庫是日本中世最重要的公立藏書機構，創建時代有多種說法，但可以確定的是，鎌倉時代文永七年（1270）以後，約宋末至元初已經存在。其藏書經室町、安土桃山時代，間有散逸，至江戶時代，德川家康將之移往江戶城富士見亭文庫（紅葉山文庫的前身），但至江戶末期幾乎完全散逸。參見小曾戶洋，《中國醫學古典と日本》第四章第四節〈諸病源候論〉二『現傳本の書誌』，（東京：搞書房，1996），頁393-394。懷仙閣為養安院的文庫名，養安院的第一代掌門人為曲直瀬正琳（1565-1611），因於慶長五年（1600）為後陽成天皇治病有功，見賜此院號，自第五代曲直瀬正珪以後，將文庫名稱改為懷仙閣，以正珪有詩文集名稱《懷仙樓集》之故。（同上註）

51 山田業廣，高崎藩醫，明治維新時，為漢方存續運動組成溫知社，是幕末考證學派的巨匠，著述極夥。參見眞柳誠〈幕末考証學派の巨峰・椿庭山田業廣〉，（電子版：www.hum.ibaraki.ac.jp/hum/chubun/mayanagi.html）

52 按《補遺》著錄：「宋槧本。12行，行23字。按此本小板小字，卷中宋字空一格，蓋宋末刊本也。」（清光緒十一年鉛印本，頁60。）可能即楊氏抄本所從出。又國立故宮博物院另藏日本元祿六年越後屋治兵衛刊本及13行23字之古鈔本。

53 《補遺》，頁60。

54 鎖國政策下的江戶幕府，對書籍的輸入管理相當嚴格，無論公私，皆以長崎為中心作成紀錄，故至今仍有不少史料可尋，其中包括書名、船運資料等，故整個江戶時期大約輸入多少醫書，或可知其大概。參見眞柳誠，〈江戶期渡來の中國醫書とその和刻〉（電子版www.hum.ibaraki.ac.jp/hum/chubun/mayanagi.html）

55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楊守敬集》第8冊，頁27。

56 楊氏藏書有半數歸松坡圖書館，因未見其書目，故不能知其詳。

57 《補遺》，頁24。

氏曾批注：「今在飛青閣」，可能即此本，但或認為是「明嘉靖年間仿宋淳祐刊本」。⁵⁸

2. 《嚴氏濟生方》十卷 宋嚴用和撰 宋刊影抄配本

是書只餘卷一前十七葉為刊本，其餘以影鈔配補，每半葉10行，行20字，卷首尾及卷一題名下皆鈐「養安院藏書」印，知其曾收藏於養安院。按《補遺》著錄楓山秘府藏宋槧本，云「缺卷一，六、八、十補寫」，其下又注云：「懷仙閣亦藏宋本第一卷，宜從而補。」⁵⁹ 懷仙閣為養安院之文庫名，故宮所藏可能即此本。

(二) 元刊本

1. 《新刊仁齋傷寒類書活人總括》七卷、《新刊仁齋直指方論》二十六卷、 《新刊仁齋直指小兒方論》五卷、《醫學真經察脈總括》一卷

此四書皆宋人楊士瀛撰，元建安環溪書院刊本。《補遺》著錄此四書，云為宋槧本，且每卷首捺「武田文庫」印，似與故宮藏本合。楊守敬云：

按森立之《訪古志》稱聿修堂藏宋槧本，半頁十四行，行二十四字，其書亦為守敬所得，實是元刊本，…其每卷或題「新刊」，或題「新編」，或題「增修」，莫知其義例所在。⁶⁰

所指即此環溪書院刊本。由書中鈐印知曾藏於武田文庫、江戶醫學館、寺田望南（自稱讀杜艸堂主人）等，最後流入楊守敬手中。

2. 《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四卷 宋錢聞禮撰

無記刊行年月，但首有至大己酉詹清子敬序，《補遺》著錄聿修堂藏本，版式、行款一致，認為是明初人從至大刊本重雕，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亦認為明初刊本，⁶¹ 由於未見有明人重刊本，故不敢遽下斷言，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元至大刊本，⁶² 藏於上海圖書館和黑龍江中醫學院圖書館，國內則除國立故宮博物院外，未見其他圖書館收藏。

58 真柳誠，〈臺灣訪書誌・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醫藥古典籍（十）〉，《漢方の臨床》50卷6號抽印本（2003年），頁926。

59 《補遺》，頁68。

60 此文原附於日本傳鈔朝鮮活字本之《新刊仁齋直指方論》二十六卷之卷首，後收入王重民輯《日本訪書志補》，《楊守敬集》第8冊，頁406。

61 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83），頁301。

62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195。

3.《新刊廣成先生玉函經解》二卷 唐杜光庭撰、宋黎民壽注

是書每半葉12行，行23字，上有「養安院藏書」印，應即《補遺》所著錄之「初明翻雕元板，懷仙閣藏」本，⁶³ 楊守敬手批鉛印本上亦記有「今在飛青閣」。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元刊本《廣成先生玉函經》，云有清黃丕烈、瞿啓甲跋，現藏北京圖書館，⁶⁴ 經查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⁶⁵ 和黃氏《蕘圃藏書題識》，⁶⁶ 皆以爲宋刊本，11行，行21字，顯然與故宮藏本不同。其實故宮藏本於題名上加「新刊」二字，已顯示其爲翻刊本。此書鈐有「小島氏圖書記」，知曾爲小島質收藏。

4.《重刊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唐孫思邈撰、宋林億等校定

楊守敬所得爲一殘本，存十卷，上鈐「杉桓簃珍藏記」。按《補遺》記「寶素堂亦藏此本」，此寶素堂藏本爲全本，後歸沈仲濤，今亦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5.《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 宋唐慎微撰

是書前附楊氏光緒十一年手書題記，⁶⁷ 卷首艾晟序後有「大德壬寅孟春／宗文書院刊行」木記，但全書各卷題名頗不一致，卷首艾晟序及目錄和卷一之卷端題名爲《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卷二十二之尾題作「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三十尾題又作「重廣補註圖經神農本草」，其餘每卷首尾則皆題《經史證類大本本草》。⁶⁸ 按元末明初有覆刻宗文書院本，題曰《經史證類大本本草》，版式、行款相近，⁶⁹ 故宮此本很可能是這類覆刻本之一。按臺北國家圖書館另藏一部，亦楊氏藏書，日人阿部隆一認爲應同屬明初覆刻本。⁷⁰

6.《類編圖經集注衍義本草》存七卷 宋寇宗奭撰、元僧慧昌校正

原藏江戶醫學館，但其上又有寺田望南「讀杜艸堂」印，按《補遺》著錄，以爲「此書即類要圖注本草而妄改題目者」，由於存世很少，北京圖書館及中醫科學院所藏亦殘本，故此本雖爲殘卷，亦相當可貴。

63 日人阿部隆一看法相同，（同註61），頁301。

64 同註62，頁191。

65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四，（臺北：廣文書局，1989年再版本），頁820。

66 （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四（臺北：廣文書局，1988年再版本），頁301。

67 此題記後收錄於王重民輯《日本訪書志補》，見《楊守敬集》第8冊，頁401-402。

68 《補遺》著錄聿修堂藏元大德壬寅宗文書院刊本，下註：「今攷此本每卷標識不能盡一，艾晟序及第二十二卷末題《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則其有備急字者，實係審元舊面，而其或換以大全字，或依有大觀刊本而稱爲大觀本草者。」（《補遺》，頁12-13），似與此本略有不同。

69 國家圖書館藏此刊本殘卷。

70 阿部隆一有極詳盡的辨明，（同註61），頁511-512。

7.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 宋陳師文編

附《指南總論》三卷 宋許 洪編

故宮藏三部，皆得諸觀海堂，楊氏在其中一部（黑口15行本）的護葉前有題記三則，稱自己又得大德八年余氏勤有堂刊本及明崇禎十年朱葵刊本云云，⁷¹但實際上與楊氏之言不盡相符：

（1）元大德八年余氏勤有堂刊本

此部不附許洪《指南總論》，但從題名、版式而觀之，似由兩種不同的版本拼合而成，即卷一和卷三是一個版本（a本），卷二和卷四至十屬另一個版本（b本）。按（a本）左右雙欄，版心題「和方幾」，其卷端題名刊「太平惠民和劑局方」；（b本）四周雙欄，版心題「和劑局方卷幾」，卷端題名作「增註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但二者字體十分相近，且同為半葉13行，行24字。由於卷十末葉記有「大德甲辰余志安刊于勤有堂」一行，故很可能是勤有堂不同時候所刻。

（2）元刊黑口15行本

此部包括《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和《指南總論》三卷，但二者分屬不同的版本，《太平惠民和劑局方》，15行，行24字，四周雙欄，版心黑口，雙魚尾，間刻「和方幾」；《指南總論》，14至19行不等，行24字，左右雙欄，版心細黑口，字體較纖細，且簡體字、俗體字極多，兩者和7-1的版本皆不同。

（3）元刊本

僅存許洪《指南總論》三卷一冊，與7-2之《指南總論》版本相同。

按此書為宋代醫局方，經多次增補，至紹興二十一年（1151）許洪校訂後，頒行全國，是世界最早的國家藥局方之一。由於所收多為常用有效方劑，又多採丸、散等劑型，適用、易存，便利群眾，影響相當巨大，⁷²至元代，刻本已極不一，《補遺》著錄元刊六種，⁷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七種，⁷⁴至明時又續有重刊，是一部運用極廣的局方書，故宮所藏除四庫全書本外，皆得自楊氏。

71 此三則題記後收入王重民輯《日本訪書志補》，見《楊守敬集》第8冊，頁403-405。

72 甄志亞編撰，《中國醫學史》（臺北：知音出版社，1994），頁226。

73 《補遺》著錄六種，包括：元廬陵古林書堂刊本、元余志安勤有堂刊本、元臨江新喻吾山錢氏刊本、高氏日新堂本（森立之以為是大德十年刊，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作元至正二十六年）、元建安宗文書堂鄭天澤刊本、不記年月之元刊本。

74 同註62，頁201-202。

（三）明清刊本

明刊本近七十部，以永樂十五年（1417）刊的《衛生寶鑑》時代最早，為太醫院判韓夷刻本，上鈐有日本「養安書院」朱印。其次成化九年（1473）羅氏竹坪堂書刊《鍼灸四書》一部，此部事實上包括四書，即《新刊黃帝明堂灸經》、《新刊子午流注鍼經》、《新刊莊季裕編灸膏肓腧穴法》、《新刊竇漢卿編集鍼經指南附鍼灸雜說》；次弘治十七年刊《新刊活人妙法針經》一部；正德間刻本二部：即正德二年楊氏書堂刊《魁本袖珍方大全》及正德六年劉氏日新堂刊「太醫院經驗奇效方」；其餘則嘉靖以後及不記年月之刊本。此近七十部之明刊本中，半數翻刻明以前之醫學著作，且多為醫學史上的名作；半數是明代較通俗的著作，顯示通俗化讀物在境外較易被接受。以下有幾部頗值得注意：

1.《新刊勿聽子俗解脈訣》六卷 明嘉靖九年集義書堂刊

此書存世相當少，國內圖書館大概只有故宮有收藏。勿聽子為明人熊宗立（1409-1482）之號，好講陰陽醫卜之學，有書坊名種德堂，刻了許多講解淺近的自編醫書。⁷⁵但此本木記署「嘉靖九年集義書堂刊」，顯然是後來的重刊本，因為此時熊宗立已棄世，集義書堂係弘治間人黃正慈的書坊名。

2.《新刊官板秘傳加減十三方》存一卷 明刊本

是書未署撰者名氏，但故宮另藏一部日人小島質影抄明萬曆鄭繼華刊本，題明徐用和撰，此鈔本卷末抄錄丹波元胤題識，云十三方出自《和劑局方》而隨證加減，可為「初學用藥之資」，並引朝鮮人蔣夔題跋，云：

初刻於明永樂十一年癸巳，乃蜀府官本，迄今宣德五年庚戌，凡十有八載矣。而遠邇聞見，求之甚多，謹用舊本重刊於官舍，誠願與衛生之士共之。

知明初已刻過兩次。按小島氏又引宣德三年清江縣儒學訓導汪賓序，言《加減十三方》附刻於《拯急遺方》中，為救急諸方的一部份。但故宮此刻本只餘兩卷，卷四為《新刊官板秘傳加減十三方》，卷五為《新刻官板秘傳外科經驗良方》，不知撰者為誰，前三卷內容亦不可知，但顯然是集各科經驗良方而成，國內各大圖書館皆未見收藏。

3.《新刊活人妙法針經》明弘治十七年魏氏仁實堂刊本

是書原有二卷，今只存卷二，其末葉有長形木記刊：「書林魏氏仁實／堂新

75 同註72，頁354；又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1999），頁429。

刊發賣」，是海內外僅存之孤本。⁷⁶其上鈐有「東都鍼醫官山崎氏藏書」印，封底墨書「仁科叔方家藏本」，皆不知藏者為誰，也不知楊氏從何而得。

此外，徐春甫編《古今醫統大全》和王肯堂輯《古今醫統正脈全書》，皆屬明代晚期醫學全書型之醫籍，反映了明代中晚期以後各類叢書編輯的盛行。因此，清刊本四十餘種，叢書就包括了《馮氏錦囊秘錄》、《醫林指月》、《徐氏醫書六種》、《黃氏醫書八種》、《周氏彙刻醫學叢書》、《當歸草堂醫學叢書初編》、《學海類編》、《平津館閣叢書》等（後二部非專以醫籍為主，但有醫籍收入其中），其餘則以通行本為多。

（四）日本刊本及鈔本

這一部份不但有翻刊或影抄中土醫籍，也包括不少日人著作，實為故宮收藏觀海堂醫書最大的特色，若以中日兩大類來分，其中又各有刊本和寫本。

1. 日本翻刻中土醫籍46部

其中有5部翻印於明朝，時間最早的是日本天文五年（明嘉靖十五年，1536）刊，明熊宗立撰《新刊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六卷，係翻刻明成化八年（1472）熊氏中和堂本，因目後摹有「成化壬辰孟春良日／鼇峯熊氏中和堂栞」之木記。

其次明馬蒔撰《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九卷，刊於日本寬永二年（明天啓五年，1625），為猪子梅壽以活字翻印明萬曆間山陰王氏本；三年之後（崇禎元年，1628）再印《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九卷《補遺》一卷。⁷⁷

次為明徐用誠撰、劉純續增之《玉機微義》五十卷，日人蘆菴左衛門於崇禎元年以活字擺印，在方書中影響日本醫界甚深。⁷⁸

最後一種為宋施發撰《察病指南》三卷，不記年月，可能是日本室町中後期刻本，⁷⁹其卷首作者序之末行刻有「兼發賣續易簡方論」，此《續易簡方論》可能是當時的進口書，⁸⁰故宮所藏為文政十年（清道光七年，1827）重刊本。

76 同註58，頁929。

77 據真柳誠，〈江戸期渡來の中國醫書とその和刻〉四-3「普及速度一渡來年と和刻年の差」所列表9，知《素問注證發微》東渡最早的紀錄為1604年，其最初的和刻在1608年，前後只差4年，而故宮此本顯非日本初刻。（電子版：www.hum.ibaraki.ac.jp/hum/chubun/mayanagi.html）

78 小曾戸洋，〈明清代の醫藥書〉，《中国医学古典と日本》（東京：塙書房，1996），序章，四-2，頁22-23。

79 《補遺》著錄此書，題「舊刊仿宋本」，為小島寶素藏本，下注云：「考板式，當足利氏時依宋本重刊者。」（《補遺》，頁30。）

80 同註78，六-1〈古活字版醫書の盛行〉有云：「十六世紀前半開始有版刻醫書之印行，不過也只有《醫書大全》、《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和《察病指南》三種而已。」。故宮藏本《察病指南》上有「兼發賣續易簡方論」的廣告詞，所指應是當時的進口書，否則不只三種而已。

接近人統計，前三種屬「內經」、「難經」系統的注解本，在江戶前期曾被不斷的重刊，顯示當時對這類較難理解的醫經有注釋上的需求。⁸¹ 因此當明正統三年（1438），熊宗立認為歷代「註家相踵，繁簡醇疵，或有遺憾」，⁸² 而將其鑽研《難經》的心得，依原文逐條加以解釋，完成文字比較通俗淺近的《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六卷，在東渡之後隨即受到日本醫家的青睞。

同樣的，明人馬蒔認為《素問》曾有唐王冰註，而《靈樞》「自古迄今並無註釋」，其內容「大體渾全，細目畢具，猶儒書之有《大學》，三綱八目，總言互發，眞醫家之指南，其功當先於《素問》也。」⁸³ 但文字古奧難懂，故以南宋史崧所藏《靈樞》傳本爲基礎，分九卷爲八十一篇，逐篇逐節加以注釋，名爲《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成爲歷史上第一部《靈樞》全注本。由於馬蒔精通針灸之學，因此對經絡穴位的注釋較詳明，並附有經絡腧穴圖解。清人汪昂在《素問靈樞類纂約註》一書就對馬蒔評價說：

《靈樞》從前無注，其文字古奧，名數繁多，觀者蹙額顰眉，醫家率廢而不讀，至明始有馬玄臺之註，其疏經絡穴道，頗爲詳明，可謂有功于後學。⁸⁴

同時，馬蒔又認為王冰之註《素問》「逢疑則默，章節不分，前後混淆」，⁸⁵ 故又重加注釋，成爲王冰之後的繼起者，雖然汪昂批評說：「馬註舛謬頗多，又有隨文敷衍，有註猶之無諸者」，⁸⁶ 但仍頗受矚目，是二書皆刊於萬曆十四年（1586），東渡日本之後，很快就有翻刻本問世。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之間，《傷寒論》的研究熱潮再度興起，明方有執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出版《傷寒論條辨》八卷，可謂首開其端，⁸⁷ 此後作注者、補充者、發揮者漸多，出版者亦多，影響東瀛醫界甚深，故翻刻者不少。故宮所收觀海堂藏《傷寒》、《金匱》之類的翻刻本約八部，其中時代較早的應是金成無己撰《傷寒明理論》三卷，此本係活字版，不記梓行年月，按《補遺》著錄容安書院藏「皇朝活字版」，下注：「此本不記梓行年月，文字精善，非葛吳二

81 同註77，三「和刻中國醫書の検討」。

82 （明）熊宗立，《新刊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卷首題識（日本天文五年（1536）翻刊本）。

83 （明）馬蒔，《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卷一引言（日本寬永二年（1625）翻刻本）。

84 （清）汪昂，《素問靈樞類纂約註》卷首凡例（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休寧汪氏令德堂刊本）。

85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一引言（日本寬永五年（1628）翻刻本）。

86 同註83。

87 同註78，頁291。

本之比；又有寬文元年（1661）梅壽軒刊行活字本，體式一同。」⁸⁸此二本可能相同，且亦可能為故宮藏本。⁸⁹但小島尚真另著錄寬永元年（明天啓四年，1624）梅壽刊本，⁹⁰則知十七世紀的翻刻本不少。⁹¹

另一方面，醫方的翻刻也不少，因為醫籍中本以方書的編纂最多，因此被翻刻機會也就相對的增多，其中又以名家或具有特色者為多。故宮藏13部，其中《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有2部版本相同，今將部份藏本略說明如下：

（1）《千金方》存一卷 日本天保三年（清道光十二年，1832）松本幸彥摹刻古鈔本

（2）《備急千金要方》三十卷附考異一卷 日本嘉永二年（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戶醫學館影刊宋治平三年本。⁹²

此二本無論原抄或原刻，中土皆已不存，其中《千金方》殘卷係取原於日本正和四年（1315）嗣成手抄本，⁹³與《備急千金要方》屬兩個不同的系統，後者係經北宋醫臣林億等人校改過的本子，名《備急千金要方》；前者或許較接近孫思邈的原作。按林億於《備急千金要方》序例言：「如白朮一物，古書惟只言朮，近代醫家咸以朮為蒼朮，今則加以白字，庶乎臨用無惑矣。」亦即原本《千金方》記「朮」，至林億等人始改「朮」為「白朮」。今兩本之南宋刻本皆存於日本，一在靜嘉堂文庫，為未經校改之本，名《重雕孫真人千金方》，乃陸心源舊藏；一在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係經宋臣校改者，《補遺》有著錄，原為米澤上杉家之舊藏，⁹⁴昭和51年由日本政府購藏。古抄殘卷則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3）《千金翼方》三十卷 日本文政十二年（清道光九年，1829）影刊元大德梅溪書院本

是書在江戶時期流傳的主要是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王肯堂校刊本，其後

88 《補遺》，頁9。

89 橋川時雄所得鉛印本《補遺》上有楊守敬眉批：「飛青閣藏」之語，（同註31），頁236。

90 小島尚真，《醫籍著錄》著錄《傷寒明理論》：「本朝活字板、寬永元年甲子季秋梅壽刊本、葛澄刊本、正脈本」等四種，小島尚真手稿。

91 小曾戶洋認為《傷寒明理論》有慶長年間的活字本，（同註78），頁292。

92 江戶醫館當年以為所據為北宋治平三年刊本，其實不然。日人小曾戶洋曾考訂，參見小曾戶洋，〈千金方書誌概說〉，《千金方研究資料集》（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9。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十五冊），頁17-39。

93 參《補遺》，頁44，聿修堂藏舊鈔本之注語。

94 《補遺》，頁45。

日本明和七年（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阿波藩以望月三英藏本重刊之，但王肯堂本譌字、脫文不一而足，故江戶醫學館的醫官遂以城東市醫白貞菴所藏本於文政間摹刻之，並作考異二卷附於後。⁹⁵

其餘除《癸巳新刊御藥院方》⁹⁶為元人著作外，皆屬宋代醫方，因為宋代印刷術發達，使官方和非官所校印的醫籍得以普及化，而讓非醫者的士人也可以從中獲取醫學知識，搜集醫方，造成宋代方書特別多的現象。⁹⁷而這些方書東渡日本之後，被抄寫、重刻，顯示其受重視的程度。

2. 日本影寫或傳抄中土醫籍

影寫或傳抄中土醫籍，應該很早就已開始，至少在印刷術尚未普及之前，所有的書籍皆以寫本的形式流傳；印刷術發達以後，傳入日本的醫籍若未能翻刻，則以抄寫的方式流傳，故有所謂影抄宋刊、影抄元刊之類。影抄，意謂依其原版式、字體照樣摹寫，則刊本雖不存，仍可略知其原貌，但通常無法傳神；傳抄則未必如此精細。

故宮所藏觀海堂古鈔本醫籍不少，值得留意的當屬隋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此書中土早已亡佚，日本仁和寺藏殘卷，當時小島尙質得此殘卷之影抄本，喜出望外，據說隨即將自己的書室改稱為「寶素堂」，⁹⁸此「素」字指的就是《太素》。此影寫本除了中土早佚之稀有價值外，其間密密寫著小島父子與同好一起校讀的歷程，最令人感佩。而從第三冊卷五末葉所書：

文政庚寅八月廿九日，得之于尾張淺井正翼，校讀一過，謹藏於寶素堂。

小島質志

知小島氏得此書的時間為1830年；第一冊末葉寫：

天保壬寅，四月廿八日，與澀江籀齋（1805-1858）、伊澤柏軒（1810-1862），同素靈二經一校於葆素堂中。質

95 同註78，頁481-485。

96 故宮藏此本為寬政十年精思堂活字本，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十著錄《御藥院方》有「朝鮮國活字本」，又云：「此本有日本寬政戊午醫官千賀芳久活字印行」。《日本訪書志》再版本（臺北：廣文書局，1981），頁695，楊氏似收有兩本。

97 謝利恒於《中國醫學源流》一書中論及《宋明間醫方》即言：「中國經籍之傳世者，至宋而始多，蓋鋟板之術盛於是時使然。然醫家之書經宋人蒐輯傳世者，醫經類甚少，同一經方也；本草亦甚少，而方書獨多。蓋醫理深邃，非盡人所能知；方藥則事足便民，好蒐輯之者較眾，而流傳亦易。」《中國醫學源流》（臺北：古亭書屋影印本，1970），頁13。

98 此據日本作家森鷗外所寫史傳小說《伊澤蘭軒》所引長井金風之言。（東京：改造文庫，1940）。另外，故宮藏《黃帝內經太素經考異》有學晦寬跋亦云：「近者侍醫小島君學古，得仁安年間寫本揚上善太素，以為希世之珍也，遂抄其副而藏之，即顏其堂曰葆素。」

又知十二年後（1842）同校者多人；其同冊另有：「弘化二年（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二日，參素問、靈樞、甲乙經校勘」語，更知用以校勘之書；至第二冊封底內葉有小島尙綱識語云：

太素經見存廿三卷，家先君從尾張國傳鈔卷第三。先兄在日，爲人借失，茲以丹波元堅本手自補寫，尚不負先君搜索古經之意云。明治三年庚午（清同治九年，1870）八月，不肖孤尙綱謹識

遂知此時小島尙質與其子尙眞俱逝。人事變遷，情非得已，書有亡失，必須補寫；而四十年之間，小島父子兄弟爲此書所付出的心力，已不可言喻，而今書散人亡，不免令人唏噓。後楊守敬據此本傳抄一過，原收藏者的情韻當然已不再，此本亦存故宮，兩者比而觀之，仍可感受到前人愛書之情緒。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各藏一殘卷，皆清抄本。

其次爲唐李勣等奉敕撰《新修本草》，爲日本影鈔天平三年（唐開元十九年，731）古寫本。是書俗稱《唐本草》，是一部由官方主導編修的本草藥典，收載藥物850種，《補遺》有著錄，謂：

蓋當時遣唐使所齎而歸……今以唐氏證類校之，異同錯出，可互是正，而彼土宋以後亡佚不傳。

此仁和寺古寫本今藏日本杏雨書屋，故宮藏三種影抄本，其中一種保留原裝模樣，爲卷子本。

影宋抄本中，有隋巢元方所撰《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頗稱珍貴。因爲巢氏成書之後，約有四百年的時間是以寫本的形式傳承，其間《外臺秘要方》、《千金方》皆曾引用之。⁹⁹入宋之後，隨著印刷術的發達，大量的醫書經由醫官校訂而刊行，《諸病源候論》亦然，¹⁰⁰可惜北宋本早已不存，今存世之宋刻唯南宋本，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¹⁰¹其後元明皆有重刊，但故宮所藏係小島尙質影抄宋本，字體娟秀，十分可觀。是書從臨床學出發，詳述各種病症的發病機理，被歷代醫家奉爲病理辨證的圭臬。

99 小曾戶洋曾作過統計，見小曾戶洋、谷田伸治，《〈諸病源候論〉對經表》，收錄於《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8冊（大阪：東洋醫學研究會，1981），頁319-331。

100 據南宋王應麟《玉海》卷六十三：「天聖四年十月十二日命集賢校理晁宗慤、王舉正校定黃帝內經素問、難經、巢氏元方病源候論，翌五年四月乙未，令國子監摹印頒行，詔學士宋綬撰病源序。」元後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刊正德嘉靖萬曆間遞修本，此卷係嘉靖年間補修者。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亦有天聖五年國子監刊行之記載。參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1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625。

101 同註78，頁391-393。

另一影宋抄本爲唐王燾所撰集之《外臺秘要方》四十卷，楊氏於是書首冊護葉內有手書題識云：

影北宋本外臺秘要方四十卷目錄一卷，原本藏日本紀藩竹田氏，森立之訪古志曰：「此本嘉永己酉，官下命郵致，使於醫學影抄，凡二通，一納楓山官庫，一藏醫學。蓋宋槧醫籍存于日本者頗多，然多南渡以後物，其北宋本如千金方猶有補刻，特此本真爲林億等經進之原刊，有明諸家所不夢見者，而首尾完具，毫無缺失」，豈可不謂天下之至寶乎！¹⁰²

但竹田氏藏本今已不知所踪，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南宋紹興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是目前唯一的全本，其餘如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本、武田杏雨書屋本、或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及故宮藏本皆不全，楊守敬所得係根據竹田本影抄，爲小島氏舊藏，用以校靜嘉堂文庫藏本，則見略有不同，因爲靜嘉堂藏本有部分因殘損而據明程氏本補刻，故已非宋刻原貌。¹⁰³ 是書選集許多東漢至唐的方書，由於王燾於引文皆注出處及卷數，使許多至宋代已亡佚之醫籍因而得見部份內容，其功不可沒。

至於其他大型方書有《太平聖惠方》一百卷，爲日本室町末期（約十六世紀前半期）傳鈔宋本，前有楊守敬手書題誌云：

森立之《訪古志》稱尾張藩庫藏宋本原刊，存五十卷，以宋本補鈔。……此本行款悉與之合，每卷首中縫下書「相州圓覺寺，第二位周音書寫」。蓋僧徒之筆，無鈔寫年月，相其紙質筆蹟，當在數百年以前。¹⁰⁴

由於此書收集宋以前方書及當時民間驗方相當廣泛，又有病證病因的論述，是一部具有臨證應用價值的醫書。當時由宋太宗作序並定書名，令鏤板頒行天下，惜「明以來失其傳（指中土）」，¹⁰⁵ 日本金澤文庫曾藏南宋槧本，於日本寬政六年（1794）「借之尾藩使於醫庠影摹一本以儲之延閣」，¹⁰⁶ 四川省博物館亦藏一抄本，有楊守敬跋，¹⁰⁷ 則楊氏所收應有兩本。

另一部爲北宋徽宗時代曹孝忠等人所編《聖濟總錄》，惜書始成，未及頒

102 此文後收錄於《日本訪書志》卷十，但略有小異，見《楊守敬集》第8冊，頁242。

103 小曾戶洋，〈宋版《外臺秘要方》の書誌について〉，《東洋醫善本叢書》（大阪：東洋醫學研究會，1981）第8冊，頁175-212。

104 此文後收錄於《日本訪書志》卷十，但略有小異，見《楊守敬集》第8冊，頁247。

105 《補遺》著錄《大宋新修太平聖惠方一百卷目錄一卷》下之注語，《補遺》，頁50。

106 同上註。

107 同註62，頁201。

行，而汴京已陷，後重刊於金大定年間。胡元立國之後，於大德初詔江浙行省刊於有司，布之天下，¹⁰⁸ 據《補遺》云：

此本吉田宗桂入明時所齋歸。其家譜稱，天文八年，與遣明使僧策彥同往留學五年，治驗甚多；至十六年再往，適世宗有疾，宗桂措劑，不日亟愈，帝喜，賞以書畫珍玩，此其一也。子孫能守不失，文政癸酉醫官子弟捐資活字印行。¹⁰⁹

知日本曾於文政年間刊行過。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殘本，楊氏所得，據日本天保三年（1832）江戶醫學館醫官丹波元堅題識，云爲日本翠竹先生¹¹⁰ 依元板傳抄，丹波元堅購以獻醫學館。

（五）日人著作之刊本、抄本及手稿本

醫籍很早就東渡日本，¹¹¹ 十世紀初（約918），一部由朝廷敕令醫官深江輔仁修撰的藥名辭典《本草和名》問世，是日本現存最早的藥學文獻。經輾轉傳抄，至日本寬政八年（清嘉慶元年，1796）始由江戶醫學館刊刻，故宮藏三部，其一即寬政刊本；另二部皆鈔本，一爲慶長五年（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抄自江戶御文庫，¹¹² 一爲森立之於萬延元年（清咸豐十年，1860）請其弟子今尾道醇謄寫者，卷末有森立之跋語，知其所本爲楓山秘府藏之舊鈔。

十世紀末葉，平安朝醫官丹波康賴，以隋唐醫方爲基礎，編撰了一部總和性的醫書《醫心方》，於永觀二年（宋雍熙元年，984）進呈，¹¹³ 引用了許多唐以前的文獻，日本安政六年（清咸豐九年，1859），江戶醫學館據半井氏家藏全帙模刻以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二部，則此書之面貌大略可知。

十一世紀末，日本僧人兼意編纂了《香要抄》，¹¹⁴ 其中可見宋代本草書被引用的情形，¹¹⁵ 故宮藏日本元享間（元至治元年-泰定元年，1321-1324）傳鈔保元

108 《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序（明鈔本）。

109 《補遺》，頁53。

110 即曲直瀬道三，其院號爲翠竹院。

111 同註78，頁7-8。

112 是書卷首有墨書二行云：「慶長五年十二月四日江戶御文庫醫□校書，意安」。

113 日本安政四年（1857）江戶醫學館影刻延慶本，卷前多紀元堅、多紀元昶題「刻醫心方序」，稱「進是書實爲圓融帝永觀二年十一月廿八日」。

114 眞柳誠，〈中國本草と日本の容受〉一文（電子版：www.hum.ibaraki.ac.jp/hum/chubun/mayanagi.html）。

115 眞柳誠，〈日中韓醫書の特徴と関連〉2-3-1『平安時代』（電子版：www.hum.ibaraki.ac.jp/hum/chubun/mayanagi.html）。

間（宋紹興二十六-二十九年，1156-1159）卷子本，亦作卷子形製，末有元享三年（元至治三年，1323）定惠手書題記，此外尚有《穀類抄》、《藥種抄》，亦兼意所編纂，皆作卷子形製。

其他屬較早的醫方有《頓醫抄》和《覆載萬安方》，前者成於1302至1304之間；後者成於1315年，¹¹⁶ 皆鎌倉時代醫僧梶原性全所編撰，前者依《諸病源候論》的疾病分類法修纂，並引用當時輸入的南宋刻本《太平聖惠方》；後者則參考元大德四年（1300）刊行的《聖濟總錄》，¹¹⁷ 故宮藏本為日本天保三年（清道光十二年，1832）鈔本。

其後戰國織豐時代名醫曲直瀬道三（1507-1594），於十六世紀末葉完成許多種醫籍，據統計，自天正年間完成《啓迪集》之後，尚有《藥性能毒》、《遐齡小兒方》、《雲陣夜話》、《鍼灸集要》、《切紙》、《出證配劑》等，¹¹⁸ 故宮藏本概況如下：

《啓迪集》存一卷：日本天正二年（明萬曆二年，1574）著者手稿本

《察證辨治啓迪集》八卷：日本鈔本

《藥性能毒》：日本慶長十三年（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山田意齋道啓刊本，山田道啓為道三門生，刻於道三卒後，為此書之首刻。

《切紙》：日本舊刊本，觀其版式，似晚明刊本。

《出證配劑》：日本文祿二年（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鈔本

而屬江戶醫學館的多紀氏父子、兄弟及其同寮友人所著醫籍，應是故宮收藏日人撰述醫書的大宗。以下為故宮所藏幕府醫官多紀氏（或稱丹波氏）家族及其相關人士所纂醫籍表：

醫 家 名	著 述	版 本 類 型
多紀元簡	素問識八卷 靈樞識六卷 傷寒論輯義七卷 金匱玉函要略方論集義六卷 觀聚方要補十卷 同上 同上 救急選方二卷 醫方挈領不分卷 醫賸三卷附錄一卷	天保八年（1837）聿修堂刊本 文久三年（1863）躋壽館聚珍本 文政五年（1822）聿修堂刊本 文化九年（1812）聿修堂刊本 著者手稿 文政二年（1819）聿修堂原刊本 安政四年（1857）聿修堂重刊本 享和間（1801-1803）聿修堂刊本 稿本 文化六年（1809）聿修堂原刊本

116 同上註，2-3-2『鎌倉・室町時代』。

117 同註78，頁19-20。

118 參考1993年日本TCM研究所印行《醫史手帳》。

	櫟窗類鈔二十卷	江戸末期聿修堂精鈔本
多紀元胤 元簡三男	黃帝八十一難經疏證二卷 柳淵文稿存二卷 體雅三卷 藥雅一卷	文政二年（1819）聿修堂刊本 聿修堂鈔本 日本鈔本 聿修堂鈔本
多紀元堅 元簡五男	素問紹識二卷 素問紹識四卷 傷寒廣要十二卷 金匱玉函要略述義三卷 雜病廣要存三十卷 藥治通義十二卷	嘉永四年（1851）小菅翼手鈔本 鈔本 文政十年（1827）聿修堂刊本 嘉永七年（1854）刊存誠藥室叢書本 江戸間躋壽館活字本 天保十年（1839）刊存誠藥室叢書本
多紀元昕 元胤之子	註解傷寒論考異一卷	日本鈔本
山田正珍 醫學館教諭	傷寒考一卷	安永八年（1779）青藜閣刊本
喜多村直寬 江戸醫學館醫官	傷寒六經析義一卷 傷寒疏義七卷 傷寒割記一卷 傷寒例考文一卷	嘉永四年（1851）江都學訓堂聚珍本 嘉永五年（1852）江都學訓堂聚珍本 嘉永四年江都學訓堂聚珍本 天保十年（1839）考古齋抄本
森立之 江戸醫學館醫官	本草經考註三卷	安政五年（1858）著者手稿本

以上多紀氏聿修堂刊本，係楊守敬透過森立之的交涉，以四百圓買下版本在中國印行，全數有十三種，¹¹⁹ 故宮所缺者為：多紀元簡之《脈學輯要》、多紀元堅之《傷寒述義》、《金匱玉函要略述義》（院藏為存誠藥室本）、丹波雅忠（1021-1088）之《醫略抄》、小阪元祐之《經穴纂要》（故宮藏本為日本文化間青雲堂刊本）。

整體而言，故宮所藏日本醫家的著作雖只佔日本千餘年醫籍史的極小部份，但已可看出中國傳統醫書對日本漢醫的影響力。

六、結 語

故宮收藏觀堂醫書多得自楊守敬之日本訪書，其間有中土刻本、日本翻刻本、日人抄本或日人著作之刊本、抄本甚而手稿，時間從南宋晚期至清末皆有，品類繁多，包括醫經、傷寒、針灸、脈診、本草及臨床各科或總和性的方書等，是故宮藏書中極有特色的一類。

119 《清客筆話》及其註36，《楊守敬集》第13冊，頁538、頁553。

從版本型態來看，以手抄本最多，畢竟從境外進口醫書非人人可得，故輾轉傳抄比較可行，即使印刷術普及之後，翻刻需有資金和市場的考量，甚至書價也不便宜，故許多漢醫會選擇以傳抄的方式取得自己想要的醫籍。若從各種刊本和翻刊本來看，則可見日本官方醫學館對醫書的翻刻投注不少心力，尤其是對大型的綜和性醫書如《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醫心方》之類，多由醫學館刊行，同時，醫學館醫生的著作亦豐，故醫學館藏有不少各類刊本。而相對於中土醫生，日本醫生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故能給予醫籍較好的收藏環境，因此被保存下來的機會也相對提高，一直到明治維新以後，漢醫地位陡然下降，私人舊籍被棄之如蔽屨，正好讓因公赴日的楊守敬得以大批購得。

楊氏當時除了購自古書店外，許多醫書皆得自日本醫員的收藏，故書中除楊氏個人藏書印外，尚可見許多日本醫家的收藏印，其中最常見的是小島尚質父子的各種藏書印，由這些藏書印，則書的流傳脈絡亦大略可知。

另一方面，這批醫書除了醫學文獻的意義外，其書上所記種種校讀過程，更令人感佩收藏者對待圖書的謹嚴和熱忱。如小島尚質於日本刊本《金匱要略方論》一書上，記載自己以五種書校勘，並以五色筆密密寫下校書過程，卷末且有後記云：

安政二年歲次乙卯，夏四月廿三日，以醫學所藏明代刊本校讎卒業。按明刊本不記梓行時月，以版式、字樣考之，蓋明氏中葉所刊，卷中訛字頗多，然照諸本猶存舊裁，非經後人校改者比。故今校雖顯然誤字，一一精對，後之讀是書者勿以迂僻目之矣。尚真

也有比較感性的記言，如小菅翼手鈔本《素問紹識》卷二尾題前記：

嘉永四年歲次重光大淵獻孟冬旬有六日，夜將三更，比忍饑寒催睡，遂終膳寫於存誠塾（塾）北憲燈下，孤松清史之案上，原本淮河翹子之本。小菅翼識之

或小島尚質於手鈔《扁鵲八十一難經辨正條例》之封底以藍筆書：

此書往年據櫟窓手澤本手錄，當時校勘，丹青滿紙，棄在舊篋中。頃因臥病多間，手自背裝、鑱釘。乙亥手鈔時，予歲十九，屈指在十七年前，而嗜書之癖固不減（當？）時也。寶素堂中秉燭記之。

皆令人彷彿感受到某種無怨無悔的堅持和追求學問的熱忱。